

#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对革命主体的理论武装探析

刘田

广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它由中国社会的全部革命力量所共同推动, 包括作为革命领导力量的党员干部群体、作为革命理论“辩护”力量的知识分子群体和作为历史创造主体的工农民众群体, 这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理论武装的群体必然是多元的。作为追求人类解放的根本理论, 马克思主义是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斗争方法论、研究范式和价值信仰, 它们共同但有侧重地武装了党员干部群体、知识分子群体和工农民众群体: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培育党员领导干部的实践斗争意识和斗争本领, 提升其革命斗争的方法论自觉和历史主动; 以唯物史观引导知识分子确立正确的理论研究取向和基本范式, 强化学术研究的现实观照; 以阶级斗争理论觉醒民众之阶级意识, 以共产主义信仰凝聚普通民众的价值和思想共识, 激活劳农群体的革命自觉。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 革命主体; 理论武装;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 12186/2024. 02. 002

**文章编号:** 2096 - 9864 (2024) 02 - 0009 - 09

推进和加强理论武装是我们党始终重视的工作。学界对党的理论武装的内涵、对象、逻辑、路径等方面进行了长久且深入的研究, 但仍存在深化空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展了对多元革命主体的理论武装, 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将“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深度结合, 铸就以科学理论武装的革命主体: 作为革命领导力量的党员领导干部, 作为最先觉悟者和理论“辩护”者的知识分子群体, 以及作为历史创造者和革命深层次力量的普通民众。我们党通过理论武装实现了对三种革命主体的充分调动, 形成了“三

位一体”的革命主体力量, 从根本上推动了中国革命实践的展开。研究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党的理论武装工作, 把握和反思这一时期理论武装的经验和教训, 有利于以高度的历史主动精神推进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武装。

## 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党员领导干部: 增强其领导革命的本领和能力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党的理论武装的重要功能, 是对党员领导干部的革命斗争意识和本领的武装, 以建立强有力的革命领导力量。对此, 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

收稿日期: 2023 - 12 - 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23CDJ005)

作者简介: 刘田(1993—), 男, 湖北省荆州市人, 广州大学讲师,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党史党建。

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唯物辩证法之于革命领导干部的重要武装作用。毛泽东认为,在以革命为主题的时期,党员领导干部长期受到诸如主观主义和机械主义等错误理论观念与工作方法的影 响,极易违背正确的革命理论,从而导致错误的行动;为了防止因不当的领导而使革命误入歧途,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将之作为“自己的精神的武器”,以方法论自觉主动地对中国革命的实际进行研究,以提高自觉斗争的意识和本领,从而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自己的头脑<sup>[1]</sup>,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发生更有利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变化。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作为关涉革命成败的核心因素之一,革命领导本领对于以革命为主要任务的中国共产党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来说极端重要。诚如毛泽东所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应当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民族的历史和革命的形势、状况,成为文化水平较低的党员的中介,“特殊地说,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sup>[2]533</sup>。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意识到掌握革命领导权的必要性与迫切性,由此开始高度重视革命领导权问题。掌握革命领导权问题涉及三个基本要素:其一,对革命领导权的争夺;其二,对革命形势的认识;其三,对干群关系的处理。这三个基本要素的形成及其作用的发挥,同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育之间存有本质联系。因而,中国共产党要实现对革命的强有力领导,需要党员领导干部在掌握军事斗争本领的同时形成良好的工作作风,并时刻与群众保持密切的关系。就军事斗争而言,在争夺和巩固革命领导权的过程中,军事斗争实际上是作为革命斗争的重要形式而存在并贯穿革命始终,掌握军事斗争本领对革命具有直接的意义;就工作作风而言,

塑造良好的作风是我们党得以保持组织机能和生命力的关键,对革命具有本质意义;就干群关系而言,与群众保持血肉般的联系,是我们党取得革命成功的根本所在。军事斗争、工作作风和党群或干群关系乃是构成党的革命领导本领的核心要素,而出于增强全党领导干部的革命领导本领的实际需要,我们党在以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武装全党的过程中,不仅高度重视以“军事理论和时事政策引领”为内容的干部教育,进行具有民主、自由、团结、包容素质的作风教育,而且积极开展一系列的群众路线教育<sup>[3]</sup>,力图使党员干部群体学习到一种风气——工作作风,一个方向——政治方向<sup>[2]108</sup>,进而增强党员干部的革命领导本领。

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中,毛泽东强调,干部的武装和教育问题乃是我们党务必关注的重要问题,党员干部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直接的重要作用,指导具有伟大意义的中国革命事业,需要组建“最好的党”,培养起一批“最好的干部”,党员干部乃是革命成功的“催化剂”和“润滑剂”<sup>[4]277</sup>。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地认识到,党对革命的真正领导、科学领导实质上是要求党员干部形成过硬的革命领导本领,而这种本领是综合素质的集中体现:在理论上是理解和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政治上是有远见的,在工作上是有能力的,在革命上是富于牺牲精神的,他们能在极为困难的革命环境中独立地解决实际问题,无论何时都能表现出“为民族、为阶级、为党”勤勤恳恳、无私奉献的工作态度<sup>[4]277</sup>。也就是说,党员干部的革命领导本领本质上是兼具政治本领和工作本领的综合本领,能够在政治上坚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立场和共产主义方向,在工作中遵循“结合着实际情况来解决问题”的“革命的”<sup>[2]109</sup>根本原则,以及在解决革命问题的过程

中展现辩证的、历史的思维能力,进而达到科学而又忠诚地为中华民族独立、为中国人民解放、为党的中心任务而工作的目的。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党虽自成立起便重视对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和思想理论教育,党员干部教育事业也由此开端,而实际情况则是从建党初期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初步设想和推行,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形成了一定规模和程度的干部教育体系,直至抗日战争时期干部教育才得以进入快速发展和壮大的全新阶段,迎来“空前大繁荣的局面”,并“以其成熟的指导思想、完整的教育体系、宏大的规模和丰硕的成果”<sup>[5]前言1</sup>,奠定了我们党干部教育事业的坚实基础。

我们党的干部教育事业的发展、壮大与我们党在理论上、思想上的成熟存在紧密联系。党员干部要始终将科学的方法论作为基本着眼点,自觉学习和掌握唯物辩证法,坚持从全局出发和从实际出发,坚持事物普遍联系的观点和运动发展的观点,坚持矛盾分析方法和“两点论”,全面地辩证地分析和解决问题<sup>[6]</sup>。这意味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思想武器和世界观指引的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了以建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上的指导思想来武装头脑和教育干部的功能作用。以“两论”(《实践论》《矛盾论》)为代表的毛泽东著述,既“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为“我们党制定干部教育的方针、原则和方法”提供了根本的理论支撑,又为“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提供了基本的教材资料<sup>[5]前言II-III</sup>。我们党理论武装渐趋深入、党的理论和思想日渐成熟的历史时期,也是党员领导干部对革命认识逐步清晰的时期。党员领导干部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地位和价值在于,通过科学的认识赋予革命行动以科学性、合理性和有效性,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提升自身的

思维能力。因此,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对于党员干部的意义在于,围绕切实地认识革命、领导革命、推动革命的根本需要或根本目的,一方面针对性地选取锻炼与训练思维能力的教育内容,另一方面制定合理的教育形式,以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结合实现对党员领导干部思维能力的培养。在这一过程中,党的理论武装最为核心的意义就在于,使中国革命的立场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方法深刻地融入党员领导干部的头脑中,进而形成关于中国革命的坚定价值立场和方法论自觉。具体而言,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理论武装将“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的观念深刻地灌输进党员干部的思维之中,使他们形成对自身历史使命的清晰认知,促使他们在革命实践中以中国的现实问题为出发点和归宿,积极通过革命解决现实问题,进而改变中国社会的整体状况;同时,为了根本性地清除长期存在于党内的非马克思主义风气,使党员领导干部行之有效地研究问题、化解矛盾,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理论武装也致力于将静止、孤立、片面、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思想观念和理论态度予以一并澄清,助推一种发展的、整体性的、全面的、辩证的方法观念转化为党员干部的内在素质和理性自觉,从而使党员领导干部真正形成以理论联系实际和实事求是为基本遵循的革命观念、革命本领。

总之,提升革命斗争的思维能力水平和方法论自觉,有助于党员领导干部提高革命水平,在诸如军事行动、革命策略等具体的革命问题中,不断生成和创新出实际所需的理论、知识与技能。作为革命领导的党员干部群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武装、教育下,提高了“政治觉悟、理论水平和文化业务素质”<sup>[5]前言IV</sup>,以及各种革命所需的“专长和技能”<sup>[5]15</sup>,极大地增强了革命先锋力量和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本领与能力,发

挥着理论思维进入社会现实进而产生实践效果的骨干和桥梁作用。概而言之,经由理论武装而培养出来的党员领导干部,成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代表和“革命建国各方面的最上乘的人才”<sup>[7]</sup>,成为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坚强而又值得信赖的核心领导力量。

## 二、以唯物史观武装知识分子:塑造学术研究的科学范式与实践旨趣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以自身所学观察、分析乃至解决社会问题是一种历史自觉与历史责任。作为探索国家出路和民族未来的最早觉悟者,以及使理论转化为实践的中介群体,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构成中国共产党理论武装的重点对象之一。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群体来说,运用自身所习得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技能分析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进而推动中国社会发生变革,乃是他们学术研究的鲜明意识和重要使命。正是基于这一意识和使命,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孜孜以求地进行理论探索和思想改造,他们围绕中国社会问题而展开的争鸣和论战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但真正具有革命性意义的研究或分析,起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在我国的真正传播。由中国共产党所寻找和确立的“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救中国”的历史使命,激励着党开展理论武装,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武器的功能深入人心,而且使其指导理论分析的方法论功能与我们党所领导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从而推动了唯物史观研究范式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真正建构。经由关乎我国社会所处历史方位的几次激烈思想论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学术知识、学术研究层面占据了统治地位,自此以后,其作为支配性的理论范式不仅主导和规范了“中国历史研究甚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数

十载”<sup>[8]</sup>,而且极大地引导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变革进展和实践发展。

借助党的理论武装而造就的唯物史观研究范式的确立过程,最为明显地体现于历史学研究之中。因为无论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面临的时代问题来说,还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面临的革命任务来说,对历史作切中肯綮的分析,毫无疑问是革命者所不得不做的必然工作。也就是说,对历史做出科学合理的阐释,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世界”乃至“改变世界”所不可绕过的问题。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作为显著区别于唯心主义历史哲学的全新历史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历史研究奠定了唯物主义和历史主义相统一的方法论基础。

由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所奠基而形成的历史研究范式即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范式。但科学的学术知识或理论研究范式的确立,定然离不开社会现实因素的决定性作用或根本需求,是必取决于其所处时代的思想与政治背景的。因此,对于马克思而言,建构一种重新阐释德国历史乃至人类社会历史的历史理论,是其认识自身所处历史环境、求解历史问题和研判历史走向的持久冲动使然;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建构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是认知和解决中国历史问题进而明确中国社会历史走向的强烈意识使然。然而,恰如美国历史学家阿里夫·德里克所言,“马克思主义史学正是在解释其时的革命变革的社会维度的努力中直接生发出来的”<sup>[9]</sup><sup>13</sup>,这种全新理论范式的生发过程起始于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和宣传,开端于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历史分析结果的伸张和强调。这意味着,我们党及其领导下的知识分子运用唯物史观全方位地分析我国社会问题,不仅重新审视中国历史,更是以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解释和对现实社会的矛盾揭示,论

证共产主义运动与无产阶级政权的合法性。他们关注的是如何解释中国历史的过去,以有助于推进无产阶级革命实现现实政治任务;同时,包括中国社会各个维度的学术或理论研究,也或快或慢、或自觉或被动地呈现出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原则的倾向,两者在不同的视野中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历史问题、革命问题,从而为革命行动的合理展开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学术研究及其范式转换的革命性影响,已由郭沫若在其名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略有论及:“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中国人应当在饱读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的同时,重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否则,缺失了辩证唯物论的观念和方法,甚至连“整理国故”的愿望恐怕都难以实现,“整理国故”的客观需要急切要求了解和掌握唯物史观的历史解释功能和唯物辩证法的历史思索方法<sup>[10]</sup>。郭沫若的“自序”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对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传入之于重新解释中国历史的可能性的揭示,这种可能性表现为将中国历史作一个符合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分析。从本质上来说,以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展开对历史的分析,可称之为一种科学的历史研究范式。重新阐释中国历史的可能性并非在郭沫若的呼吁或“社会史论战”之后才开始显现,其作为一种对于历史的全新理解方式,是伴随唯物史观进入中国社会和我们党展开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必然结果。这种研究范式逐渐为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关注和运用,一方面是唯物史观的深入传播及其历史解释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进程中不断展现的趋势使然,另一方面则是中国知识分子迫切要求回应中国革命问题的需要所决定,他们解决中国社会革命中不断

涌现的问题的强烈意识,推动了以唯物史观研究和反思中国问题与唯物史观研究范式的逐渐形成。

从经济政治与文化之间的本质关联来看,代表着能够产生全新经济形式和政治文明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集中体现新的经济政治力量的文化形式具有形成的可能性,新的学术研究范式的形成乃是新的文化形式产生的突出表现之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为例,以唯物史观为理论范式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我们党的诞生、成长、发展乃至挫折同频共振,它“与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使命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sup>[11]</sup>。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救中国”为根本政治取向和奋斗方向的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理论武装,必然要使得革命时期的学术研究目的、研究范式具备强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特质,即触动和引导当时的知识分子关注中国社会日益剧烈的变革及其背后的现实问题,自觉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唯物史观的原则、方法,建构一种具有强烈现实导向的学术研究范式,以科学的学理分析服务于革命需要。这种研究范式生成的根本价值或意义则在于,为当时中国社会的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之间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意识形态斗争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和有效的认识工具,从而在实践层面积极改变民主革命时期的社会状况。在这一意义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产生的诸领域的学术变革,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度融入中国学术的必然结果和历史效应<sup>[12]</sup>。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运用唯物史观的过程中,获得了对“历史问题复杂性的意识”,随着革命的深入推进,“这种新意识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史学研究领域”<sup>[9]12</sup>,中国知识分子关于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思考被唯物史观予以塑造并逐渐概念化,造就了以唯物史观为基本原则的历史研究范式。这一范式即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超出了中国传统史学的研究视野和关注领域,超越了传统史学的理论分析架构和叙事结构。关于中国历史的唯物史观阐释,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当时人们对中国历史问题的准确理解,而且提供了解决中国社会最根本问题的出发点,深刻影响了社会科学诸领域学术研究范式和理论分析方式的变革,从而在方法论层面对中国社会诸问题的实际解决起到了理论的先导和前瞻作用。

在历史学领域率先生成的唯物史观研究范式,是在关于中国历史的传统权威解释被迅速破坏而又没有新的替代性解释的“空档期”确立的,从而为当时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历史学家提供了重新书写历史所急需的方法论。其在历史阐释上所具有的优越性及其与中国社会的革命性变革之间的内在关联,更是挽救了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危机。从史学领域拓展至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的唯物史观研究范式,实际上也为隶属于各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诸如社会学、艺术学、教育学、文学等所急需的方法论基础,它们的出现、发展与壮大共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 三、以共产主义信念武装普通民众:激活工农群众的阶级意识和历史主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正经历着由内外部冲击所导致的剧烈社会变革过程,回归传统与走向现代的两难困境造成了社会意识即主体观念信仰的混乱,中国社会面临着重塑民族意识与文化心态的重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入和被初步接受,为中国社会意识和信仰由多元混乱趋于统一、中华民族精神的革命性重建奠定了根本理论基础,党的理论武装的展开不仅逐渐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大众有机

结合,而且使建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唯物史观的共产主义观念逐渐成为中国社会主体的普遍信仰,逐渐趋于统一的信仰在推动中华民族走向意志重振和精神重建的过程中,支撑了中国社会的广泛而深刻的共产主义实践之积极展开。

近代以来,现代性将中国社会强行裹挟进世界历史进程并造就了其后长久的现代化过程,其间中国社会既在经济、政治制度等显性的社会结构方面表现出剧烈的封建王朝解体与分裂,又在隐性的社会意识方面内蕴思想文化观念等要素由传统向现代的缓慢转变。实际上,后一过程较之于前者更显艰难和痛苦。这是因为“中国底思想界,可以说是世界虚无主义底集中地;因为印度只有佛教的空观,没有中国老子的无为思想和俄国的虚无主义;欧洲虽有俄国的虚无主义和德国的形而上的哲学,佛教的空观和老子学说却不甚发达;在中国这四种都完全了,而且在青年思想界,有日渐发达的趋势”<sup>[13]</sup>。陈独秀对中国思想界境况的观察与分析可谓一语中的,由此也能一并窥见新旧信仰“青黄不接”引发的近代中国社会的信仰危机。正如有学者所说,五四时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虚无主义的时代”,传统文化观念的崩坏和新信仰的未近,使新旧知识分子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在各种新思潮之间迷茫<sup>[14]</sup>,这种民族信仰和精神意志的颓靡状态,源于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信仰迷惘、“主义”选择困难所导致的怀疑主义之风。

清末以来,中国社会曾出现各种“主义”盛行的现象,时人对于新思潮、新观点均冠以“主义”之名,虽在一定程度上启蒙和唤醒了国人,但在各种形态的“主义”未能完全被细分开来之前却造成了国人思想上即“主义”认同上的混乱状况。随着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入,五四后期及其后的中国社会存在的诸多“主义”

逐渐呈现为两种不同性质或功能的样态:第一种是作为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知识化主义”,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解释性存在,其特征在于其未必具有确定的内在价值或内容,而是能够根据实际效用或标准自由灵活选取;第二种是作为意识形态的“信仰化主义”,“具有某种道德正当性和启示性的终极真理”,它成为个体存在的立命之本和集体的价值共识<sup>[15]</sup>。两种不同形态的“主义”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人们基于不同的“主义”会形成不同的理论视野与实践视野,进而引发具体行动或策略的相左。从这一视角看,“问题与主义”之争在根本上就是由两种不同性质的“主义”引发的,而这意味着两种“主义”的分野。这一论战虽然未能从根本上克服中国社会的信仰危机或将认识统一到同一“主义”之上,但其就“主义”存在的合理性与使用的适当性的探讨,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共产主义信仰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营造了思想氛围。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入和传播,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近代中国的社会运动具有了科学的观察方法和领导力量,但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要成为中国社会普遍的信仰即意识形态层面的“主义”尤其是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念共识,仍需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而在这一期间,意识形态层面的“主义”的缺失,仍制约着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发展。正如1922年梁启超在驳斥非宗教同盟的文中所表达的:信仰乃是个人和社会存在发展的“源泉”和“元气”,然而,“中国人现在最大的病根,就是没有信仰……像这样的国民,说可以在世界上站得住,我实在不能不怀疑。我说:现在想给我们国民一种防腐剂,最要紧是确立信仰”<sup>[16]</sup>。尽管梁启超所提倡的信仰并非以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为唯一的意识形态“主义”,而是涵盖包括宗教、知识学说等在内的广义信仰,但他确实发

现与肯定了信仰对于凝聚国民力量和社会力量的极端重要性。因为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组织与纪律是能够被紧密联系起来的,严密的组织和纪律为保障行动的落实提供了基础,“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缺乏“主义”必然无法形成革命的共识。因此革命必然不可以感情的牵绊为基础,而要自“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确立起“主义”的大旗,革命者才可以“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sup>[17]</sup>。如果没有“主义”,就等于没有统一而确定的信仰,也就不可能建立起组织与纪律,更无统一的革命行动,因而需要建立统一组织作为革命斗争的前提条件。由此,确定信仰基础之上的组织行动,才是重建民族精神与文化心理并彻底摆脱中国社会“一盘散沙”之局面的唯一出路。

我们党的理论武装也是基于这一认识而展开的。建党之前,中国工人阶级已然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但这仍是既无“主义”也无组织的自发行动,因此便往往因组织混乱而陷于行动的失败之境。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工人阶级运动即“主义”与组织行动相结合的直接产物,它的成立不但意味着这一种“主义”已成为部分国人的信仰,从而开辟了民族精神气质的重建之路,而且意味着开启了中国社会革命运动由自发阶段向自为阶段的转变过程。然而,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信仰并非一经确立便不再动摇,民族精神信仰的重建也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仍然面临着扩大“主义”接受范围和抵御其他“主义”的冲击与挑战等问题。我们党在中国民众中确立共产主义信仰的最主要目的在于,以提升“人民群众的觉悟”和“去掉人民脑子中的错误思想”<sup>[18]</sup>,来回应与超脱各种带有虚无性质的主义对社会历史发展及其前途的怀疑,进而实质性地建立起关于中国社会历史发

展的积极观念,以及关于能够合理地改造中国社会的理性认识。

我们党成立以后,不断运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自身和教育群众的目的即是如此。从根本上来讲,共产主义是由唯物史观所指明的关于人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sup>[19]</sup>的理想或信仰,它建立于坚实的哲学基础之上。我们党通过对普通群众的理论武装,一方面普及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基本观点、基本内容;另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分析问题、指导革命行动,既能拓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革命主体“相遇”的渠道和路径,加深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理解,夯实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信仰的主体基础,也能展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于其他哲学的超越性与优越性,削弱各种哲学与“主义”对革命基础、群众基础的侵蚀。“基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持续深入开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力超出了知识分子阶层而普及到中国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sup>[20]</sup>,随之而来的是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观念在普通党员和群众中的传播和发展,开拓与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信仰文化重建之路。对于中国广大的普通民众来说,建立于唯物史观基石之上的共产主义观念能够赋予他们共同的政治信念与革命信念,并由此结束他们自近代尤其是五四以来所遭遇的信仰与“主义”混乱境况,深刻地“表明个人的现实意志和职业活动生成了社会共同体”<sup>[21]</sup>。一方面,共产主义信仰在人民群众这一社会历史生成与变革主体中的普遍确立,具有在观念与思想层面振奋人心、重建民族精神意志的思维力量,强有力地扭转了中国社会自卑的文化心态和依附发展的民族心理,内在地型塑着自信而独立的民族文化意识和民族精神气质;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民众的结合以及共产主义信仰的确立,能够实现“批

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的结合,既为中国社会提供改造社会的科学理论,又通过统一信仰汇聚主体改造世界的磅礴力量,因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sup>[22]</sup>,从而在根本上宣告中国社会革命摆脱长期缺乏群众基础、脱离历史主体的尴尬境地,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主体创造中国历史的普遍意志和自觉行动表征为中国人民群众的轰轰烈烈的共产主义运动。

我们党的理论武装发挥着推动马克思主义进行实践转化的功能,在以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武装头脑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从外在于人的理论状态逐步转化为广大国人的内在文化信念<sup>[23]</sup>。共产主义这一建立于坚实哲学基础之上的“整全性的意识形态”,成为当时中国社会民众的普遍信仰并发挥着引领、激励、约束和归省民众行动的作用。而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决定的共产主义的现实性和科学性,又使其所预测的中国社会前景与当时的革命行动之间保持着合理的张力。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能够提供完整而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形而上的抽象理论架构,又可以指明诸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形而下的革命行动;它承继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极强的科学性和思辨性,并以隐匿的方式使共产主义信仰具有类似基督教的末世论、弥赛亚主义一般的思想浸染力<sup>[15]</sup>。我们党的理论武装正是主动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普及与教育,使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以一种“刚性化”但又并非强制的方式将信仰稳步地刻印在当时中国民众的头脑中,为他们的信仰精神倾注实践主体、历史主体、革命主体所具有的能动创造性<sup>[24]</sup>,使他们日益增进对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一种兼具科学性与思辨性、理想性与现实性、崇高性与世俗性特质的理解,且能够彻底破解中国诸多问

题的可靠“主义”或哲学信仰的认识,从而为源源不断地将创造历史的主体性力量转化为中国社会政治实践的现实性力量提供可能性。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初步尝试以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百余年来,理论武装已然成为我们党引领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历史性胜利的重要秘诀。对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来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凝心铸魂,是发扬百年大党的优良传统的历史必然,也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现实需要。深入探讨党的理论武装,应当成为当代学人的理论共识和学术自觉。

###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58:10.
- [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 张晓萌.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实践:基于陕北公学的历史考察[J].教育研究,2020(6):50.
- [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77.
- [5] 张腾霄.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教育:抗日战争时期[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 [6] 宋彦璋,秦位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党的思想建设中的运用与发展[J].求索,2009(11):103.
- [7] 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20.
- [8]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65—68.
- [9] 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M].翁贺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 [10]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9.
- [11] 李红岩.中国近代史学史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5.
- [12] 陈鑫.理论、历史、现实:准备把握“两个结合”的三重维度[J].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4(3):19—26.
- [13] 陈独秀.陈独秀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3.
- [14] 许纪霖.从疑到信:五四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J].天津社会科学,2020(5):129—130.
- [15] 许纪霖.五四知识分子通向列宁主义之路:1919—1921[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9):131.
- [16]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7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3969.
-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册[M](修订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70.
- [18]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31.
- [1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2.
- [20] 郝戈.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建构[J].江海学刊,2012(1):79.
- [21] 田冠浩.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理由[J].江苏社会科学,2017(2):96.
- [2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
- [23] 陈学明.将经典转化为自身内在的素质和底气[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0(6):140.
- [24] 庞立生.历史唯物主义与信仰精神的革命性变革[J].哲学研究,2020(9):16—18.

[责任编辑:侯圣伟 聂海杰]



引用格式:刘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革命主体的理论武装探析[J].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5(2):9—17.